国家社科基金
GUOJIA SHEKE JIJIN HOUQI ZIZHU XIANGMU
后期资助项目

佛教四书学

Buddhist Interpretation of the Four Books

韩焕忠 著

人民出版社

佛教四书学

Buddhist Interpretation of the Four Books

韩焕忠 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段海宝
封面设计:毛　淳　徐　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佛教四书学/韩焕忠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3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ISBN 978-7-01-014606-5

Ⅰ.①佛…　Ⅱ.①韩…　Ⅲ.①佛教-研究　Ⅳ.①B94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49958 号

佛教四书学

FOJIAO SISHUXUE

韩焕忠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龙之冉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5 年 3 月第 1 版　2015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6
字数:270 千字

ISBN 978-7-01-014606-5　定价:40.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主要类别之一，旨在鼓励广大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潜心治学，扎实研究，多出优秀成果，进一步发挥国家社科基金在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中的示范引导作用。后期资助项目主要资助已基本完成且尚未出版的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研究的优秀学术成果，以资助学术专著为主，也资助少量学术价值较高的资料汇编和学术含量较高的工具书。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学术影响，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2014 年 7 月

序

韩焕忠博士是著名中国哲学史家和宗教学家方立天先生的高足，其博士毕业后作为优秀人才被苏州大学引进，在苏大哲学系从事中国哲学史教学至今。与小韩同事多年，深感其勤奋好学，工作敬业，在各种不同的场合与他进行学术交流，发现其对儒、道、佛的基本经典异常熟悉，及至成为他的博士后导师后，更具体地感受到他不但学术功底扎实，而且思想很活跃，有学术创新精神。

2009年，中国哲学史学会和苏州大学哲学系联合主办了“多元价值审视下的中国哲学”学术研讨会，我在会上曾作总结发言，指出其与会论文有五个方面的特点，其中之一是“在研究方式上，注重儒、释、道三者的互相关系，从这种联系中来进行综合研究”，并特别提到韩焕忠的论文《佛教对中国孝文化的贡献》。① 会后，曾与小韩有过交流，我赞成并希望他继续按“综合研究”的路子来进行佛学研究。正是顺着这个研究思路，后来他终于选取“佛教四书学”作为其博士后课题。小韩不但顺利地完成了该课题研究，其成果还被列入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本书是该课题研究的最终成果，值此付梓之际，我向小韩表示衷心祝贺。

被宋儒程颢、程颐兄弟率先合称为“四书”的《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在二程以前，只是受到学者们分散性的关注，从二程起，才受到理学家的集中关注，而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之作，更是被当代某些学者视为标志着所谓“四书学”的正式确立——郭齐勇先生则认为“朱子的这部著作无疑是宋代人‘四书’学的集大成者”②。据实说，“四书学”之名并非是古已有之，它是由当代学者提出来的一个新的学术名词。“四书”虽是理学时代极受重视的儒家经典之精华，但就理学来说，它的诠释对象却绝不限于“四书”，原本作为经学诠释对象的《周易》等儒经仍受到理学家们不同程度的

① 参见拙文：《促进跨文化哲学对话，发展21世纪人类哲学智慧》，载蒋国保主编：《多元价值审视下的中国哲学》，安徽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② 郭齐勇：《四书学的过去与未来——序新版〈四书章句集注〉》，载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湖南岳麓书社2007年版。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关注，被公认为宋代理学大师之一的张载，其研究重点更是放在《周易》上的。故即使是在单纯的儒学史意义上，那个时代也并不存在着一门独立于理学之外的所谓四书学。由顾炎武开启的所谓“经学与理学之辨”，反映出明清之际儒学内部存在着对于“四书”与“五经”在儒学中的地位孰重孰轻的不同看法与争论，而被清代学者公推为朴学开山祖的顾炎武提出“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的口号，则不仅标志着宋明理学开始向清代朴学过渡，同时也标志着儒学诠释的重点对象开始由“四书”转向“五经”了。要之，由宋代至清代，尽管儒学的具体形态有历史性的变化，在这过程中，“四书”受到不同程度的重视，但却始终没有形成一种专门以“四书”作为诠释对象的独立学问——四书学。

在学术史上，四书学不是一门独立的学问，然而，这无妨于人们可以在“四书学”名目下开展相应内容的学术史研究。事实上，随着最近二三十年来“国学热”的不断升温，四书学研究日益受到重视。迄今为止，除了发表在学术期刊上的若干论文以外，周春健的博士学位论文《元代四书学研究》(2008 年)是较有代表性的学术专著之一，嗣后，周博士又推出了《宋元明清四书学编年》(2012 年)。但此类论著，基本上是把四书学纳入儒学史范畴来加以研究的，就是像周春健的《四书学编年》这样多少带有“四书学通史”性质的著作，也忽视了佛学界关于“四书”的诠释内容。韩焕忠博士的《佛教四书学》一书，自觉地将中国佛教高僧大德对“四书”的佛学解读也纳入四书学范畴，并名之曰“佛教四书学”，这拓展了四书学研究的范围，在内容上弥补了《四书学编年》的上述缺憾，也在理论上使四书学概念的内涵更趋明晰——本书“导论”将其界定为“那些注疏、诠释和阐发《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而形成的学问”。

本书是在收集了佛教经籍和文集中的有关资料并加校勘、句读，使之成为可利用的文本，并初步构想和设定了佛教四书学的研究框架的基础上写成的，通过对这些资料的细致梳理和史论结合的深入分析，既简明扼要又相当系统地展示了佛教四书学从汉末至唐代的酝酿、宋代的兴起和近代的发展与演变过程，而且由于作者将该历史过程本质地理解为儒佛之间自发地开展的“经典互读、宗教对话、文化适应和思想融合”的思想文化发展过程，故本书不只是给出了佛教四书学之基本的历史线索和学术内容，还较为具体而生动地展示了儒佛两种不同思想文化传统间彼此互动的历程。在这个意义上，此书不仅对于中国佛学史研究具有充实和深化的重要意义，而且对于中国儒学史研究也具有积极的推进作用。

本书对于正在进行并越来越受到重视的四书学研究无疑作出了独创性

贡献。但或许正因为其研究是开拓性的，本书在具体论述上还未免显得有些粗疏，希望小韩再接再厉，在该研究领域付出更大的努力，取得更大的成就。

周可真

目　录

序 …… 周可真 1

导　论 …… 1

第一章　四书前学与佛教的中国化 …… 8

第一节　《理惑论》的借儒自重 …… 8

第二节　《二教论》的联儒抗道 …… 13

第三节　隋唐宗派的儒学判释 …… 18

第二章　宋代佛教与四书学的兴起 …… 25

第一节　孤山智圆的儒学观 …… 25

第二节　明教契嵩与儒家四书 …… 31

第三节　无尽居士的《护法论》 …… 42

第四节　大慧宗杲与儒家四书 …… 49

第五节　无垢居士的《论语》偈颂 …… 56

第三章　四书学与宋明佛教界的辩护 …… 68

第一节　屏山居士对佛教的辩护 …… 68

第二节　刘谧的《三教平心论》 …… 81

第三节　姚广孝对程朱排佛论的批驳 …… 87

第四章　明末居士的四书学 …… 98

第一节　焦竑对四书的佛学解读 …… 98

第二节　袁宗道对四书的佛学解读 …… 108

第三节　张岱对四书的佛学解读 …… 122

第五章 明末高僧的四书学 …… 133
第一节 憨山德清对儒家经典的佛学解读 …… 133
第二节 吹万广真对儒家经典的禅学解读 …… 143
第三节 永觉元贤对儒家问题的佛学解释 …… 154
第四节 觉浪道盛与儒家四书 …… 165
第五节 智旭的《四书蒙益解》 …… 172

第六章 近代佛教四书学 …… 186
第一节 尊孔而抑孟——杨文会的《论语发隐》与《孟子发隐》 …… 187
第二节 欧阳渐的四书学 …… 197
第三节 马一浮对《论语》的佛学解读 …… 210
第四节 印顺法师的大学纲目论 …… 218
第五节 生活禅的儒学底蕴 …… 227

结 论 …… 239

参考书目 …… 242
后 记 …… 246

导　论

学术界往往将那些注疏、诠释和阐发《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而形成的学问称为“四书学”。此学在宋元明清时期堪称显学，儒家学者无不汲汲于此，因此留下的著作可以说是汗牛充栋。除了儒家学者之外，历史上有不少高僧和居士也留下了注疏和诠释四书的著作，如憨山德清的《大学纲目决疑》与《中庸直指》、蕅益智旭的《四书禅解》、欧阳渐的《孔学杂著》等。这些著作因为是注疏和诠释儒家四书的，自然应属于四书学的范围，但毕竟是高僧大德的作品，与儒家学者有诸多的差异，为了突出其特殊性，我们姑且称之为“佛教四书学”。

一、佛教四书学研究的内容

《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曾经是促成外来佛教中国化的思想资源。佛教东传以后，那些受到攻讦和责难的高僧大德们先是借重《论语》等儒家经典为佛教的教化中土进行论证，继而又努力适应《孟子》的性善论而奠立起中国佛教法藏的础石——佛性论，至隋唐时期逐渐形成了天台、华严、禅、净土等佛教宗派，最终完成了自身形态的中国化，得以与中国固有的儒道二家分庭抗礼、鼎足而立，并以哲学思辨的玄妙及心灵慰藉的真诚而使儒家思想相形见绌。

入宋之后，儒佛两家的情况发生了显著变化。儒学开始走出困境，实现复兴；而佛教则失去了蓬勃发展的态势，一些高僧大德对儒家经典的态度也有所改变。孤山智圆以僧人身份而自号“中庸子”，公开表明了他对儒家经典的尊崇。明教契嵩广泛涉猎儒家典籍，与当时著名的儒家学者进行交往，著有《中庸解》，并据《中庸》《论语》《孟子》著《非韩子》，对韩愈的排佛言行进行反驳，如入其垒夺其兵而破其军。大慧宗杲在向当时的士大夫们弘法传禅时经常引用《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儒家经典，无论是对佛教，还是对儒学，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佛教的输入，在诸子百家之外为国人开出一个崭新的精神空间，也为国人阅读和理解固有经典提供了完整的参照系统和思想方法，这一点在张九成所著《〈论语〉绝句一百首》中体现得非常充分。这些人开启了佛教四书学的先声，对儒家四书学的形成也产生

了深刻的影响。

儒家四书学的主要任务固然是揭橥孔孟等儒家圣贤的意旨，但也往往成为理学家们排斥佛老的工具。佛教界的一些大德们认为，排斥佛老的理学家们误解了儒家四书，违背了孔孟的原意。他们运用“勘误”和“纠谬”的方式重新解释四书，引用孔孟为佛教进行辩护。张商英虽自居于儒，但又虔信于佛，所著《护法论》，堪称运用儒家经典论证佛教合理性的典范之作。李屏山根据儒家经典批驳宋儒，为佛教进行辩护，锋芒毕露。刘谧在《三教平心论》中所表达的三教并立思想，颇有运用文化分工的方式为佛教争取地位的意味，而他引用儒家经典对儒者排佛之论的驳斥，则是当时的佛教界主动、积极地适应儒家思想形态，并试图从儒家经典中为自身发展寻找理论依据的体现。姚广孝的《道余录》，不仅是日渐式微的佛教界对强势地位的程朱理学的思想抗争，也是佛教界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积极适应。这些驳斥儒家四书学的著作，成为佛教四书学的一种非常独特的表现形态。

居士们游走于儒佛两界，自然不愿意看到两家的交相攻讦。他们运用佛教的思想和义理诠释儒家四书，希望以此寻求儒佛二家的一致，实现两家思想的相辅相成、相互为用。焦竑对儒家四书的佛学解读，一方面将佛教思想纳入到对儒家四书的理解之中，另一方面也将儒家四书置于佛教义理的视野之内，他打破了儒、道、佛三家的思想壁垒，给人类的思维活动开辟了一个无比广阔的精神空间。袁宗道对儒家四书的佛学解读，虽然无意自立异说于朱熹的《四书集注》之外，但其思想中阳明学的色彩还是非常明显的，其最为推崇的当代思想家就是歧出于阳明后学的李贽，体现了晚明时期儒、道、佛三教合一的思想潮流。明末遗民张岱所著的《四书遇》是一部以读后感的方式解释儒家四书的著作，其中引用了不少佛教，特别是禅宗的话语，与当时盛行的理学家高头讲章相比，张岱对四书的解释显得比较亲切、自然，富有情趣。这些居士们的著作，极大地推进了佛教四书学的发展。

高僧们以讲经的方式住持佛法，为了引起士子们的兴趣，就以解释四书的形式，将佛教的义理融入其中。憨山德清对《中庸》《大学》等儒家经典的佛学解读既是他个人思想旨趣的充分体现，也是晚明佛教界向居于意识形态主流地位的儒学积极靠拢的反映。永觉元贤对太极、变易、人性、格物、中和及儒佛关系等宋明儒家最为关注的基本问题进行了探讨，并且给出了佛学的解释，一方面将佛教的思想观念渗入到主流意识形态之中，另一方面也将有关的儒家经典纳入到佛教的教化体系之中，从而使佛教继续保持思想创造的活力以及对社会精英的影响力。吹万广真著有《一贯别传》一书，以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明心见性的观点对《周易》《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进行了诠释，将这些儒家经典纳入了中国禅宗的语境之中。觉浪道盛生当明清鼎革之际，处于“天崩地解”之时，他以禅学作为解读结构挖掘儒家四书的胜义，实际上也是对那些不愿臣事异族的明末遗民抱有强烈同情心的一种表现。蕅益智旭所著《四书禅解》，更是充满“以佛释儒”以便“诱儒以知佛”的高度自觉。这些高僧对儒家四书的研读和诠释，形成了佛教四书学的典型形态。

近代以来，西学东渐，儒学和佛教同时经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因此这时的佛教四书学就集中体现了儒佛两家在欧风美雨飘摇中的唇齿相依。杨文会以佛教义理发《论语》《孟子》之隐，认为孔子足以媲美佛陀，而孟子则难以继踵孔子，其尊孔而抑孟，与历史上的四书学有所异趣。欧阳竟无早年学儒，中年事佛，晚值日寇侵华，于山河破碎之际目睹血肉横飞，乃抉发孔学真义，编定《孔学杂著》，而摄之以佛，试图以佛家“空诸一切”的勇毅和果敢，破除孔子身上积淀起来的尘封垢闭，恢复孔学本有的精彩。马一浮通过对《论语》的佛学解读，使自己的学思得到了比较全面的表述和展示，在坚持儒家立场的同时，公开借鉴佛教义理以阐释儒家经典，为儒家学说的新发展开辟了无穷的思想空间。印顺法师在解释《大学》时，将这一儒家经典置入佛教的话语体系中，同时也运用三纲领和八条目对佛教的相关思想进行了组织和解说。净慧法师所倡导的生活禅是中国佛教在当代社会中契理契机的开展方式。净慧法师及其追随者明海法师在讲经说法时除了广引佛教经论之外，还经常引用《周易》《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儒家经典，充分彰显出生活禅具有非常丰厚的儒学底蕴。这些都表明佛教四书学在将来仍然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高僧大德们对四书的佛学解读，实际上是佛教与儒学的深层对话、语境置换与视界融合。佛教为外来宗教，儒学乃本土文化，两者相互异质，在价值取向、思维方式等方面存在重大差异，高僧大德注释儒家经典就是佛教试图消除分歧的一种对话。高僧大德们注释四书，很自然地会将儒家话语置入到佛教语境之中，又因为其预设的受众主要是儒生，所以又会将佛教的思想观念用儒家能够接受和熟悉的方式讲说出来，由此形成了儒家和佛教两种语境的相互置入。无论是高僧理解的儒家经典，还是儒生理解的佛教思想，都具有异质思想相互理解的意味，自然会形成儒学和佛教的视界融合。本书将按照历史的顺序，对历代高僧大德们运用佛教义理注疏和诠释四书的著作加以研究，将儒佛两家的深层对话、语境置换与视界融合充分展现出来。

二、佛教四书学研究的意义

佛教四书学的实质就是对儒家四书的佛学解读。这应是一个非常有趣也很有学术意义的课题。但从思想发展史上看,高僧或居士对四书的解释,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佛教文献,所以佛教的各种《大藏经》大多不予收录;这些著作中运用了大量的佛教义理和思想方法,因而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儒学著作,儒家学者也多不加注意。从目前的学术界来看,研究儒家的学者有时不能对佛教经典做深入的分析和同情的了解,而研究佛教的学者则主要关注高僧大德们的义理建构和终极关切,往往不太注意他们对儒家经典的诠释。因此,时至今日,学术界对佛教四书学仍缺乏必要的研究,未能形成系统性的成果。笔者认为,对佛教四书学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

其一,可以对宋代以来儒佛关系进行深入研究。儒学与佛教的关系问题是中国哲学史、思想史乃至文化史上的重大问题。佛教在传入中土的初期,对于在中土居于主流地位和起着主导作用的儒学只能采取适应的策略,并由此完成了外来佛教自身形态的中国化。到了隋唐时期,佛教凭借着中印文化综合所形成的优势,开创出几个中国独有的佛教宗派,得以与儒道二家并立共存,甚至在心灵慰藉、思辨善巧和社会影响上取得了可以睥睨儒家的优势,一度占据了中国思想领域的制高点。入宋之后,儒家在佛道思想的影响下由尊崇五经转而为推尊四书,实现了儒学由经学到理学的形态转变,重新执掌了思想领域的牛耳,并恢复和强化了在社会生活中的强大影响力。这时佛教界的高僧大德们在大力促进佛教向社会下层开展的同时,运用佛教的义理对当时最受尊崇的儒家四书进行解释,意在继续保持对社会精英们的思想影响,因此宋以后的儒佛关系较之其前就更为复杂和多样。而那些高僧大德对儒家四书的注疏和诠释,恰恰形成儒佛两家的融会点和交汇处,于此既可以看出佛教对儒学的积极适应和深刻影响,又可以衡量儒学对佛教发展方式的规范、型塑和引导,故而成为研究儒佛关系的极好的切入点。

其二,可以对儒佛两家的视界融合进行深入研究。儒学可以说是中国人理解和接受佛教的前解读结构。从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历史来看,在佛教传入之前,儒学既已成为官学,成为居于主流地位的意识形态,在国家政令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因此也可以说中国文化对佛教的接纳和融摄是通过儒学才得以实现的,中国佛教是印度佛教与儒道等中国固有文化

相互融合的产物。从中国高僧大德的个人成长经历来看，他们在出家之前，往往都有深入学习儒家经典的经历，儒学为他们深入研习佛教经典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因此在中国高僧大德的佛学思想中包含有丰富的儒学因素，也为他们出家之后仍然对儒学抱有特殊的好感埋下了种子。当这些高僧大德面对着普遍尊崇儒学的社会群体，特别是面对那些饱学儒书而出入仕途的士大夫们时，自然会努力寻找佛教与儒学的共同话语。既然四书是僧俗双方都非常熟悉的话题，那么高僧大德们便以讲论四书的形式畅演佛理，将儒家的经典置入到佛教的话语系统之中，使那些士大夫们产生出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由此形成了一种儒佛相摄相入、亦儒亦佛的历史效果。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所谓佛教四书学，就是儒佛两家的视界融合。因此，对佛教四书学进行研究不失为深入理解儒学和佛教视界融合的有效途径。

其三，可以对中国传统经典解释学进行深入研究。现代意义上的解释学是以西方思想界诠释和理解《圣经》为基础而建立的一门学问，对于人类深化自我认识、拓展精神空间产生了积极作用，因此有不少学者在大力引进西方解释学的同时，也试图建立中国的解释学。我认为，中国学者的这一努力是值得肯定的，但真正的中国解释学不可能是对西方解释学的简单移植，而必须以中国自身的经典诠释作为思想和文化的基础。事实上，与西方相比，中国的经典解释历史是非常丰富的。这不仅表现在中国解释经典的历史发轫于遥远的先秦时期，表现在中国的经典解释有儒、道、佛三家，还表现在儒、道、佛三家除了关注和解释自家经典之外，对其余的两家经典也有所涉猎。佛教四书学就是高僧大德运用佛教的思想义理和经典诠释方法对儒家经典的解释。因此，如果说西方解释学所说的视界融合主要体现为古与今的融合的话，那么中国经典解释中形成的视界融合除了古今融合之外，还有儒佛、儒道、佛道等的视界融合。佛教的高僧大德在诠释儒家四书时所形成的效果历史，为研究两种异质文化相互融合、相互渗透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范例。因此，对佛教四书学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对于建立中国特色的解释学自然具有非常高的借鉴意义。

除此之外，研究佛教四书学，还可以丰富人们对中国佛教史、思想史和文化史的认识，为人们全面理解宋元以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

三、佛教四书学研究的思路

对于如何深入开展佛教四书学研究，我的基本思路是，按照历史发展的

顺序，尽可能多地收集有代表性的文献资料，对其加以细致解读，在对儒佛的思想进行具体比较中充分展现两家的视界融合，从而勾勒出佛教四书学在各个时期的存在形态。

从历史的演变来看，佛教四书学就表现为儒佛之间多个回合的交涉：先是高僧大德借重儒家《论语》等经典为自家教化中土的合理性进行论证，促成了外来佛教的中国化，并由此引起社会思想界对四书的重视，最终促成了儒家四书学的形成。儒家学者们以解释四书的方式排斥佛教，引起一些高僧大德的不满，他们对这些排佛言论展开反诘，指斥他们的排佛是严重误解了四书的本意。无论是护持佛教，还是排斥佛教，正反双方既然都以四书为依据，那么四书也就具有了不可置疑的正确性，于是一些居士就运用佛教义理诠释四书，将他们所推崇的佛理禅意纳入到四书学的思想体系之中。一些高僧在讲说佛法时，也喜欢运用四书，从而将四书纳入到佛教的教化体系之内。近代以来，在欧风美雨的飘摇之中，儒学逐渐失去了其在社会意识形态中的主流地位，演变成“无体可附”的“游魂”，而佛教则获得了宗教的存在形式，四书由此也成为佛教摄化众生的思想资源。儒佛之间这六个回合的交涉，既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又内含着逻辑的必然性，因此就成为本书设立六章的依据。

站在佛教的立场上看，在上述儒佛交涉的每一个回合中，佛教界都产生了许多有关四书诠释的文献。这些文献或者散落在个人的文集之中，首尾不相连属，人们偶或见之，不免有神龙见首不见尾之叹；或者隐藏在汗牛充栋的各种佛教藏经之间，给人一种“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的感觉。职此之故，有关佛教四书学的文献资料虽然谈不上罕见，但要将其条理化、系统化则确非易事。本书无法做到，将所有的佛教四书学文献搜罗毕至，因此只能收集那些具有代表性的文献资料。而所谓“有代表性”的认定，则与著作者本人在佛教史上或思想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有关。以此为标准，僧界的孤山智圆、明教契嵩、大慧宗杲、憨山德清、永觉元贤、吹万广真、觉浪道盛、蕅益智旭和近现代的印顺、净慧等，以及居士界的张商英、张九成、李屏山、刘谧、姚广孝、焦竑、袁宗道、张岱、杨文会、欧阳渐等人，就成为本书特别关注的对象。本书对他们的相关著作进行了比较详尽的解读，力求全面展现他们为佛教四书学所作出的独特贡献。

佛教四书学研究实际上也是一种微观的思想比较研究。以前有关儒佛比较研究的一些成果，大都局限在宏观比较研究的领域，如谓儒学是土生土长的世俗文化，而佛教是一种自印度传入的宗教，故而在关注重心、价值取向、思维方式、修行方法、社会作用等方面存在着极大的差异。这种比较对

于人们从整体上把握儒佛两家的界限和特征虽然不无助益，但不免失之于笼统，有时甚至会似是而非，因为思想发展的历史是极其复杂的，任何一般性的宏观之论都难保其不会犯以偏概全的过错。本书对高僧大德在诠释四书中所形成的文献进行了比较细致的解读，期望由此展现儒佛二家在具体观念上的相同之点和差异之处。这种在微观层面上展开的比较研究自然会比那种宏观比较研究深入得多了，而且还可以在四书学的框架之下，避免“只见树叶，不见森林”与“只见森林，不见树叶”的局限性。

以上所说，是我研究佛教四书学的基本思路，也是我想在本书中达成的目标，目注心营，积累之久，也许会有实现的那一天。而高僧大德们关注儒家四书，在主观上只是出于化世导俗的需要，并没有建构一种学说的意图，由此导致了高僧大德们诠释四书带有极强的随意性，也注定了本书所说的“佛教四书学”必然具有极大的开放性，因此本书所举出的例子虽已不少，但未能遍举的例子也许更多。

第一章　四书前学与佛教的中国化

“四书”这一概念形成于宋代，对于宋代以前有关《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的学问，我们可以称为“四书前学”。佛教东传汉地，即与居于意识形态主流地位、对社会政治思想文化诸多领域起着主导作用的儒家发生交涉。四书前学对于促成外来佛教的中国化发挥了重大作用，而佛教界的高僧大德对于《论语》等儒家经典的引用、比附、适应和诠释也构成了佛教四书学的前奏。这方面的史实不胜枚举，本书仅以《理惑论》的借儒自重、《二教论》的联儒抗道及隋唐诸宗的儒学判释为例对此略作疏释。

第一节　《理惑论》的借儒自重

佛教的传入，一方面丰富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引起一些开明人士的归敬；另一方面也引发了思想领域的震荡，引起了一些保守人士的不满。保守人士依据儒家经典，对佛教僧侣的出家、独身、禁欲等修行方式大肆攻讦，而开明人士往往亦据《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以自解，从而使佛教呈现出一种既欲依附儒家又要超越其上的发展态势。这一点在中土佛教的早期文献《理惑论》中体现得极为明显。

《理惑论》为《弘明集》第一篇，又称《牟子理惑》，意为牟子所撰，又署“一云苍梧太守牟子博传”，然据该文序意，显系讹传。《弘明集》为梁僧祐辑录的中土佛教界护教论传文集，所收诸文基本以时间为序，僧祐既置为初篇，表明梁代学僧皆视此文为中土最早的护教文献。但近代以来，学术界对此文的产生年代曾有争议，梁启超、吕澂等人以笔力浮乏、间有晋宋习用之语等认为是南北朝所作；而汤用彤、周书迦等人则据文间所述事实考之正史，谓其可信，且可补正史之不足，主张为汉末所作。① 本书认为，笔力浮乏乃学力问题，而足见其朴实、原始；晋宋习语其来有自，未必不能于汉魏之际偶已用之，或晋宋之人在抄录之时以当时的语言改换汉魏用语也未可知，故而从汤用彤等议，断定此文形成于汉魏之际，为东汉末年的作品。

牟子在《理惑论》中自设宾主，以问答的方式将当时排斥佛教与保护佛

① 参见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52—57 页。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